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研究——以 A 公司为例

许睿 杨琳 商颖 周佳琪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 为实现快速的外延式发展, 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增加, 导致上市公司并购溢价过高, 商誉价值剧增, 公司管理层借助于商誉减值损失估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大额商誉减值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本文以 A 公司为例, 分析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及问题所在, 并分析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内部人才稀缺、并购过程价值评估方法不适用、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不完善以及外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外聘各类专业人才、完善并购价值评估方法、改进商誉后续处理方式与加强外部监管等建议。

关键词: 商誉减值; A 公司; 盈余管理; 并购商誉

近年来, 我国资本市场日趋繁荣, 部分上市公司为扩大规模实施并购, 盲目溢价并购使得商誉金额增长迅速。根据 Wind 数据库统计, 2014—2018 年商誉价值从 3333 亿增长为 13076 亿, 增加了近四倍, 年平均增长 31.44%; 而商誉减值从 27 亿元突增为 1659 亿元, 增加了 60 多倍, 年平均增长 128.61%。2018 年 11 月证监会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 2019 年 3 月, 财政部则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誉减值监督的通知》, 强化对商誉减值的重视与监管。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 以 A 公司为例, 分析上市公司大额商誉减值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以期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商誉价值并合理评估商誉减值做参考, 同时, 帮助投资者理解商誉减值背后蕴含的企业信息, 做出正确投资决策。

一、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对商誉减值的研究集中于商誉减值的定义、商誉减值的现状、商誉减值产生的原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商誉减值是企业合并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确认的价值损失, 企业必须每年对商誉对应的标的物进行公允价值评估, 以确认商誉减值的金额(谢荃等, 2020)。

合理的商誉减值帮助企业正确认识相关资产的价值与收益, 然而, 一次性大额计提商誉减值可能向证券市场传递虚假信息, 损害投资者利益。2014—2018 年, 商誉占净资产的比值不断上升, 部分企业的商誉占权益比重超过 100%, 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增加了企业未来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 为企业的经营带来不确定因素(邓鸣茂等, 2019)。

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一方面是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 当上市公司年度业绩不理想、预期收益亏损、维持业绩动力丧失时, 管理层倾向于操控会计数据, 计提大额商誉减值(Alfreda Sapkauskiene, 2016; 唐家艺等, 2019); 另一方

面, 管理层对并购决策过度自信, 并购过程产生高溢价, 而后期业绩无法完成时通过计提高额商誉减值确认损失(何军, 2019; Haiting Weng, 2020)。

有研究证实商誉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值越高, 商誉减值风险也越高, 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也越大, 商誉减值与公司股价、股票收益率负相关, 投资者对商誉减值的公司持消极态度(Kevin K. Li, Richard G. Sloan, 2017; 何瑛等, 2020; 张黎焱, 2020)。

由上可知, 已有文献实证研究商誉减值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等,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方法, 深入探讨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二、A 公司商誉减值案例分析

A 公司前身是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是一家集游戏、应用发布平台、广告、影视于一体的泛娱乐产业集团。2014 年 7 月, 天神互动公司通过科冕木业在深交所借壳上市, 2015 年 4 月, 更名为 A 公司。2015—2018 年, A 公司连续超高溢价并购妙趣横生、雷尚科技等数十家企业。A 公司的商誉资产在企业净资产中的占比均高于 60%, 2017 年占比虽略有下降, 但 2018 年却急速上升, 2018 年末, A 公司商誉的余额为 26.18 亿元, 占净资产的 111.69%。伴随着商誉资产的不急增, 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也持续增加, 2016 年, A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 1364.96 万元, 占当年商誉账面余额的 0.29%, 2017 年, 计提商誉减值 3037.89 万元, 占商誉账面余额的 0.46%, 2018 年 A 公司经减值测试共计提商誉减值 40600.23 万元, 是商誉账面余额的 1.5 倍。

大额商誉减值对 A 公司公司的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2016 年和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占当年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 而 2018 年计提商誉减值 40.6 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 亿元,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71.5 亿元, 亏损额度接近营收的三倍, 严重拖累年度业绩。同时, A 公司因巨额商誉减值损失, 导致市场信心受挫, 股价大幅下跌, 至 4 月 30 日年报正式发布, 公司股价下跌超过 20%, 主动停牌。此外, 2015—2017 年, A 公司多次以巨额现金加股票方式实施并购, 货币资金大幅减少, 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从 2014 年的 10.90% 上升到 2018 年的 72.65%, 2019 年初, 该公司连续发布多条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显示, 其正处于资金状况紧张无法偿还多笔贷款的困境中。

三、A 公司大额商誉减值问题分析

(一) 内部人才欠缺

A 公司年报披露, 公司的技术工作人员占 62% 左右, 高管人

员中从事技术、销售的人数占到较大的比重,从事法律、金融投资、财务管理等背景的高级管理人才较少,从员工受教育程度看出,公司员工学历处于大专及其以下的人员占到员工大多数,公司整体员工结构与质量有待提高。公司实行内部委托,A公司的治理层、管理层均由董事长把控,独立董事、监事公司监管作用缺失。

(二) 并购过程价值评估方法不适用

A公司2015-2017年并购子公司的价值评估方法均采用收益法。收益法应用的基本条件是处于可持续经营状态,资产管理与收益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而且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以被预测和量化。对于游戏和互联网广告等新兴行业的游戏公司来说,容易受到外部宏观环境和研发团队的影响,且生命周期较短,因此,该类公司无法满足现行收益法的使用条件,导致并购溢价过高。

(三) 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不完善

现行会计准则要求商誉资产定期进行减值测试,何时计提、计提多少商誉减值由企业估计,主观性较强。2016-2018年A公司业绩下降,未完成承诺的利润,每年应按实际情况计提商誉减值金额,然而企业却在2018年计提了40.6亿元的巨额商誉减值,可以看出,A公司操控了减值发生的时机,前两年少量计提,以维持企业利润,保持短期业绩,掩盖企业持续亏损的真实情况,而在第三年一次计提大额减值,避免持续亏损和退市。

(四) 外部审计监管不到位

我国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需要具备审计独立性和职业怀疑精神,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出具适当的审计意见。然而,由于利益驱动和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再加上内部人控制权力集中而导致审计独立性受到影响,审计质量不佳。2014-2018年,审计机构并未关注A公司计提的系列并购行为与大额商誉减值,2014-2017年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2018年为保留意见。

四、结论与建议

商誉资产来源于企业并购中的溢价收购,具有不可辨认性,是企业整体价值的一部分,是企业中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上市公司如果利用商誉减值操控公司利润,会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方面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外聘各类专业人才,高素质通用人才与专业性人才并举。优秀的通用性人才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布局与发挥行业的集群效应,相对于A公司这样基础并不雄厚的年轻公司,通过外聘金融领域专家或行业专业化人才,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人才缺乏带来的经营性问题。

第二,完善并购价值评估方法。上市公司在并购其他企业时,对标的企业的价值评估没有做到全面估值、真实有效,导致超高商誉溢价,破坏资本市场环境,因此,为了有效防范以及降低商誉减值风险,需要完善并购时的价值评估程序,探索实用准确的价值评估方法,规范商誉确认和计量手段,使评估结果更加

全面、公允地反映并购企业的真实价值。具体表现为,在并购前期,应对标的企业做好调研工作,收集相关财务、非财务信息,为最后的价值评估提供数据支持;在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从标的企业的行业特点和目前发展阶段出发,保证价值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在核查确认价值评估结果时,从财务和非财务因素进行综合协调和处理,提高价值估值质量。

第三,改进商誉后续处理方式。现行实行的会计准则要求对商誉的后续计量不再使用摊销法,而是统一使用减值法。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特性,到底使用何种计量方式,要考虑我国社会状况以及企业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行业特点,不能一味与国际接轨。对于A公司这类轻资产企业的商誉后续计量,可以使用摊销法和减值法结合的方式,即在商誉减值现象出现之前便将商誉价值进行合理摊销,在每年年末或者有减值需要的时候,对企业存在的商誉进行减值准备。如果发生减值,则进行减值处理。我国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对商誉减值的本质和确认范围有详细说明,然而针对会计处理具体操作的说明有待完善。

第四,加强外部监管。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重视上市公司商誉资产的计量准确性以及商誉减值损失计提的合理性,发挥有效的稽查职能,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完善监管机制,规范企业经济行为,营造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 [1] 谢荃,符祎明.我国影视文化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分析及控制建议[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1):107-114.
- [2] 邓鸣茂,梅春.高溢价并购的达摩克斯之剑: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J].金融经济研究,2019(6):56-69.
- [3] 唐家艺,张楠.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爆雷”事件分析[J].金融会计,2019(8):40-43.
- [4] Alfreda Sapkauskienė, Sviesa Leitonienė, Eligija Vainiusienė. Disclosure of Goodwill Impairment in the Baltic States[J]. Engineering Economics, 2016(27):417-429.
- [5] Haiting Weng, Review of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 Goodwill Impairment Research[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0,(08):121-128.
- [6] 何瑛,李雯琦.基于管理者行为的掌趣科技商誉减值剖析[J].财会月刊,2020(01):10-18.
- [7] 张黎焱.深市“文化传播类”上市公司商誉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0(03):39-45.
- [8] Kevin K.L., Richard G. Sloan. Has goodwill accounting gone bad?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7(06):964-1003.
- [9] 何军.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相关问题及建议探析[J].理论探索,2019(23):9-10.